

《新闻传播精品导读·通讯卷》引用内文。 作者供图

梁衡

命运真是作弄人，我在大学学的是档案，一个最保守、保密的专业，想不到一出校门却当了新闻，一个最活跃、开放的专业。而且赶上了一个出新闻的好时代。

1978年8月到1987年3月我在《光明日报》工作。这期间正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文革”结束，迈向改革开放，各种新事、新人层出不穷。1980年5月底，我到山西忻州采访。听说大王村有一个叫岳安林的农村青年，承包猪场，成效显著。当时农村人民公社还没有撤销，人们还没有从极左思维下解放出来，“承包”还是一个新词，一种冒险的举动。我到村里去找他，却不巧他进城了，就在村里先做了一点外围采访。岳安林很有代表性，很能说明那个时代的政治背景、人物命运。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他曾经考上清华大学又被退回农村（当年高考要政审，家庭出身不好的考生会在档案里盖一个“不宜录取”的章），回乡后又长期遭到不公平待遇。我去时他已经穷得拆卖了半间房子，山墙烟熏黑裸，高粱秆编的一扇院门，靠在两个木桩上。当晚我赶回县城，又在招待所里采访了他。这时改革的春风已开始温暖他的心，他已开始走出谷底，正雄心勃勃要搞一场养猪革命。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在受难的日子里居然还自学了两门外语，读了不少科技书，承包的猪场也大见成效。

第二天我即到火车站，准备赶回太原向北京发稿。不想买好票后火车晚点，那个年代百废待兴，火车不正点是常事，我经常在外出采访时利用等车时间写稿。掏出纸笔，不想圆珠笔却没油了。这是一个四下无人的小车站，根本没有任何商店。我环顾空荡荡的候车室，无奈时突然眼前一亮，在售票窗口前有一支供旅客用的简陋的圆珠笔，怕人拿走用一根细线系在窗框上。就走上前去，斜着身子倚在窗台板上，借这支带“疆魂”的笔写稿。幸亏小站旅客极少，较少打扰。车晚点了3个多小时，我草成一篇1800字的通讯《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一回记者站，连夜誊清发稿。作为一篇反映时代变革的人物通讯，这篇稿确实很短。这与倚窗借笔写稿的简陋条件也有一点关系。曾有一外国名作家为了能写出短稿，就专门站着写作。闻一多说，诗歌是戴着镣铐跳舞，这篇新闻稿写作时既是站着写，又是“戴着镣铐”写，当然也不会长了。

稿子发回北京后又在编辑部压了两个月，基层改革发展很快，我心急如火，但当时我进报社才一年多，“新媳妇”刚过门，哪敢催问？稿子直到11月14日才见报。作者和编辑部都没有料到的是，读者反响异常强烈，来电、来信一直持续到第二年4月。稿件的写法也受到重视，社内的业务刊物还专门发了一篇赏析文章。为此报社又让我重返大王猪场再作深度报道，去后我发现岳安林自己也收到3000多封来信。基本是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叹时代变了，人才终于得到重视；二是讨求具体的养猪经验。有的信很有故事性，如生产队平时读报没人听，这天读时不但听，还七嘴八舌地议论，读完后这张报就不翼而飞了。有一封来信说，他是走亲戚时在人家糊的炕围子上看到了这张报纸的。因为已糊到墙上取不下来，他是趴在炕上侧着头看完内容又全文摘抄下来的。这些来信让记者和岳安林本人都十分感动。他就顺应时势，索性办起了一个面向全国养猪培训班。地方上也破格用人才，将他由农民转为国家干部，又直接任命为地区科委副主任，并划出一块农业实验区由他主持工作。

那一段时间，我成了岳安林专家，陪他到处作报告，帮他回复信件。特别是为了宣传他，我要到有关部门核实、审稿。一般来讲记者与报道对象最贴心，为他们着想，为他们解困，为他们的成功而高兴。我印象最深的是奉命写好续稿，要去跑主管部门审批。我跑到当时的农业部，转了几个办公室没有结果，已到中午下班时间，我也不走。大夏天，坐在人家大楼外的台阶上啃面包，等下午上班再求人。陆游说写诗的功夫在诗外，其实记者所费之力绝大部分都是在稿子外。好在功夫没有白费，岳安林这个典型终于宣传出来了。

他后来经历了一些波折，但基本上还算幸运，一直干到正常退休，又被北京的一家大养猪场聘用了一段时间。到现在我们还保持着联系。我深刻地体会到恩格斯的那句话，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正是这样一个时期。时代造就英雄也造就记者。相比英雄，记者不是创造时代的主人，却是记录时代的笔主。在这一个题材上我得了三个大奖：1980年度也是首次的“全国好新闻奖”、第一届青年文学奖、首届赵树理文学奖。可以说它是我的成名作。这篇作品1990年收入我的第一本新闻研究集《没有新闻的角落》（书海出版社）。2004年7月又被选入大学新闻专业用书《新闻传播精品导读·通讯卷》（复旦大学出版社）。这时距作品见报已经过去24年。

现在回想这篇作品所以成功有三点：一是得力于那个年代，顺应了时代潮流；二是我长期在农村生活，了解农村，对农民有深厚感情；三是，我始终感谢中学教育给我打下的古文基础，文字精练，不光这一篇，以后的许多文章都得益于此。

本报记者周长庆

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富丰教师新村一个普通民宅里，长春72中退休教师纪福来珍藏着一盘小石磨。在抗战胜利76周年纪念日前夕，这位69岁的抗联后人向记者讲述了石磨的来历。

纪福来的父亲纪荣年轻时，家在伪满洲国统治下的吉林省敦化县前河村。他为人正派，憨厚老实，善交朋友，精通各种农活，酿过酒，打过铁，干过石匠、木匠，还经常上山打猎。他痛恨日本鬼子，具有很强的爱国心。

每到冬季，纪荣就用马爬犁给木材商拉木头，赚钱养家。1934年年末的一天，24岁的纪荣与另外7人赶着马爬犁进山拉木头，被围剿抗联的日军截住，要强征他们的马匹驮运军火。纪荣不给，一名日本军官抽出战刀就劈他，他一躲闪，棉衣被劈了一个大口子。他撒腿就跑，七拐八拐钻进密林深处，依靠熟悉地形，把追他的4名鬼子甩在后面。但不幸脚下一滑，从山坡上摔了下去，脚也摔伤了。追上来的鬼子正要对纪荣开枪，突然4声枪响，4个鬼子应声倒地。原来，纪荣是被恰巧路过的东北抗联五军二师部队所救，领头的是戴克政排长。在纪荣引导下，他们很快将这股掉队的日本鬼子运输小队消灭。

前河村位于敦化与蛟河交界处，周围森林密布，距离县城较远，日寇控制较弱。抗联第五军军长周保中指示戴克政在前河村秘密物色一个可靠的人作交通员，以便及时获得吉林市与敦化方面的情报，又能掌握镜泊湖方向和长白山方向抗联密营情况。经多方调查了解，他们选定了纪荣。

本报记者冯源

记者生长在杭州，小时候从长辈口中经常会听到一个聪明绝顶而又尖刻促狭的人物，不论老幼妇孺，高官平民，只要得罪了他，都会被整蛊一番。他的名字听起来像“齐文章”。

及至会读书了，方知道“齐文章”是徐渭，字文长。他的这些故事，来自旧时与杭州一江之隔的绍兴，而且是后人慢慢安在他头上的。

500年前，徐渭出生在绍兴。这个夏天，绍兴城里的一场展览，掀起了一轮“徐渭热”，也让更多的人认识了真实的徐渭。

笔底明珠

《草书评书法》《行书昼锦堂记》《行楷书千字文》《草书千字文》《墨葡萄图》《墨花图》《梅花蕉叶图》……从5月19日起，来自全国30余家文博机构的100件（组）藏品齐聚绍兴市区的徐渭艺术馆，在“畸人青藤——徐渭书画作品展”上亮相。

徐渭艺术馆坐北朝南，设计借鉴了徐渭《山水图》的墨韵笔法，抽象出黑山白水的生动肌理。从南北两面看去，又似徐徐展开的扇页。

展品中，有64件徐渭的书画作品，20件文献古籍，还有16件属于艺术史上的“后学作品”。担任策展方的绍兴博物馆副馆长沈一萍说，这是迄今为止，全国举办的徐渭临展中，规模最大、藏品最优、参展单位最多的展览。

例如，故宫博物院的《墨葡萄图》《行书千字文》，国家图书馆的《初进白鹿表》，上海博物馆的《草书春雨诗帖诗卷》，广东省博物馆的《淮阴侯祠卷》，山西博物院的《草书咏月诗轴》、青岛市博物馆的《群望诗轴》和宁波天一阁博物院的《白燕诗轴》等名作都是首次外展。特别是有的名作只在初期参展，因此，不少书画爱好者纷纷闻风而动，只求先睹为快。前两个月的观展人次已达7万之众。

对于徐渭在艺术史上的成就，多位前辈权威学者曾给出高度评价。在《徐渭年谱》的引言中，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徐朔方教授写道：“历代名家在文学艺术的领域中涉猎之广也许只有唐代王维和他相近。王维的音乐和涉猎的戏曲各为对方所缺。”他还认为，如果精选徐渭的诗作进行比较，未必输于王维。同时，“徐渭的散文略加编选，肯定比王维不多的几篇传世之作更受人注意。”

而在《中国画史》中，著名中国美术史专家王伯敏教授同样指出：“徐渭以水墨大写意作花卉，奔放淋漓，追求个性的解放，所画‘无法中有法’‘乱而不乱’。他那随意挥写的花草都可以见出其笔墨的微妙变化，具有秀逸情趣……他的书法，造诣很高，其跌宕纵横的笔姿，有助于绘画艺术上的巧妙变化。”

2008年，作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的首批成果之一，《畸人怪才——徐渭传》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作者、西泠印社出版社总编辑江兴佑告诉记者，徐渭的水墨大写意花鸟画可谓前无古人，继者不绝，受到了八大山人、石涛、郑板桥、吴昌硕、齐白石等后世名家的极力推崇。“花鸟画发展到明代中期，所有促成徐渭绘画历史成就的笔墨语言刚好发育成熟，从而使他把花鸟画推到了大写意惊涛骇浪的巅峰。”

“徐渭在70岁生日时作诗自称‘畸人’，自编的年谱也叫《畸谱》。‘畸人’的典故出自《庄子》，指不流于世俗而合于天道的异人。”对于展览的名称，沈一萍解释说，而为了借到这些作品，策展方也花了不少心血，从2017年就开始筹备。

“徐渭是中国艺术上一颗耀眼的明星，在文学、书画、戏曲等各方面独树一帜，甚至还精通兵法。以往关于他的展览，往往着重于书画成就。此次展览则要全方位、通史性地介绍徐渭的一生，向公众展现其人、其事、其文、其艺。”沈一萍说。

徐渭作品中大幅立轴多、长卷多，策展方还专门定制了4米或5米的高柜和20米的平柜，让观众一览无余。

闲抛闲掷

有一个“明代三大才子”的说法，指的是解缙、杨慎和徐渭。但是，这三大才子的遭遇都相当悲惨。解缙最大的成就是主编《永乐大典》，后来涉及皇家“夺嫡”之事，下狱

说人解史

小石磨里的抗联故事

戴克政对纪荣说：“周保中军长让我跟你谈谈，抗日战争不是一年半载能结束的事情，要有长远打算，做好长期准备。恳请你为抗联做点事。”纪荣爽快地答应了，同意在前河一带建立抗联秘密联络点，为部队筹集物资、传递情报。

戴克政又说：“你能不能为抗联做一盘小石磨？重量不要超过60斤，便于随军携带。”纪荣回答“没问题”，并约好10天以后交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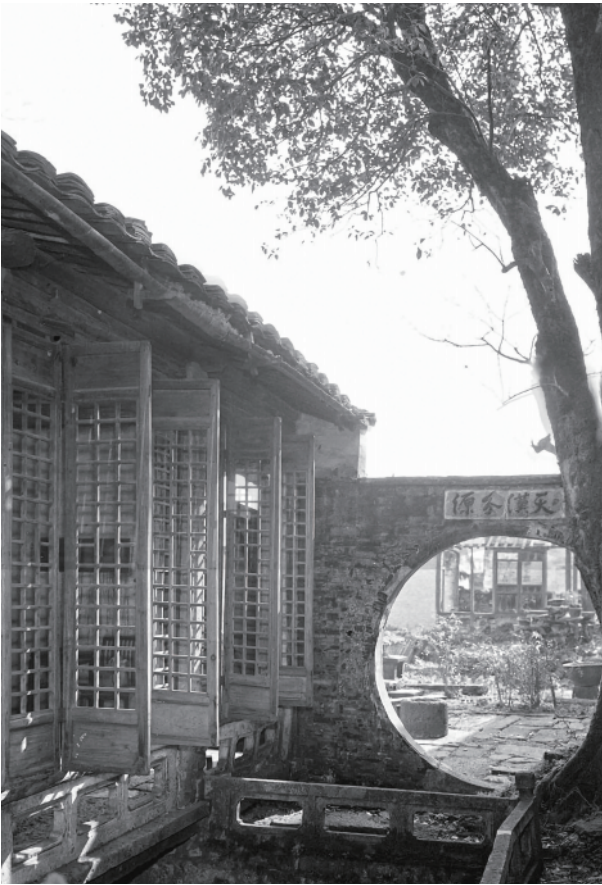
纪荣第二天就找个石匠做帮手，用7天赶制了一盘小石磨，直径31厘米，厚度15厘米，重量50多斤。他自掏腰包给那个石匠付了工钱，并谎称石磨是给亲戚家做的。

1934年年末开始，这盘石磨跟随抗联五军二师东战西征、转成长白山林之中。每到一地，部队只要一停下来，小石磨便开始在战士手中转动，人累了就换人，人歇磨不停。它磨过苞米碴子、谷子、黄豆、橡子面，给抗联将士尤其是伤病员解决了大问题。

1936年隆冬的一天，纪荣带着爬犁队在给抗联送给养途中遭遇一小股土匪拦截。16岁的抗联女战士戴素云坐在最后一副马爬犁上，刚一发现土匪立刻躲入路旁树丛中悄悄溜走，迅速跑到事先约定的地点给叔叔戴克政报信。戴克政带人抄近道将土匪包围，激战中，土匪张炮头打伤两名战士，又瞄准戴克政要开枪。这时趴在地上的纪荣捡起身边一块石头砸在张炮头手上，把枪打掉，但此时枪已响，子弹打飞了戴克政的棉帽子。张炮头在捡枪时被抗联战士打死，其余土匪也被消灭。

戴素云自此对纪荣有了好感，后来他们结成夫妻，共同

徐渭故居古藤青未了



徐渭的故居“青藤书屋”之一角。新华社发资料片

处死。杨慎是当朝宰相之子，24岁就高中状元，同样卷入了皇家的继承权纠纷，流放云南，我们最熟悉的杨慎作品，就是《三国演义》开篇的那阙《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但是他们好歹有过一段春风得意的日子，相比之下，徐渭的命运则是充满了各种悲剧：出生百日父亲去世；生母是给嫡母陪嫁的婢女，在他十岁时就被嫡母卖掉；得到潘家岳父赏识招赘为婿，与结发妻子潘胡宗宪手下做幕僚，胡宗宪在严嵩倒台后入狱，他又害怕受到牵连，可能慢慢就有了精神疾病——九次自杀未遂，最后竟然杀死继妻，银铛入狱。用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的话说，就是“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

“徐渭是天才式的人物，但是个性多疑。”江兴佑最近完成了一篇考证文章，认为徐渭当时可能是间歇性精神病发作。他分析说，这个性格和徐渭的境遇有很大关系——在男权社会里，身份是庶出，后来又做了赘婿；两位兄长死后，家产被人设计夺占；当时的文人只有功名一条路是正途，但是他八次参加乡试，都没考中举人……

“徐渭这么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就是想把自己的一生才华体现出来，但是屡战屡败。”沈一萍说，这可能与他的性格不愿受到束缚，不肯循规蹈矩有关——他给胡宗宪和礼部尚书李春芳当门客时也是如此，胡宗宪优容他，两人合作就比较愉快；李春芳轻视他，徐渭就不辞而别。最后，他和至交张元忭也闹翻了——张元忭为他出狱出了不少力，找他主编《会稽县志》，还请他去北京；但是到了北京，徐渭又受不了张元忭对他的约束。“之前他给胡宗宪做幕僚，代笔的文章再好，署名也不是自己的，还要吹捧嘉靖皇帝和严嵩，内心也很委屈。”

活到73岁，徐渭去世了，身边只有一条老狗做伴。20岁那年考中的秀才，早因为杀妻入狱被革。当时是他第二次考试仍不中，专门给浙江提学副使张和上书，才争取了复试的机会。

相比之下，比他小四岁，同样有神童之誉的张居正却是一考一个准。湖广巡抚顾璘怕张居正少年得志容易自满，还嘱咐监考官故意让他落一次榜受一次挫。张居正落榜一次，第二次乡试考中了举人。那一年仅16岁，即开启了通往大明“救时宰相”的人生。

在“一考定终身”的时代，徐渭肯定是无奈的，否则也不会在自己的杂剧《女状元》中有这样的台词：“不愿文章

负责给抗联五军收集情报，筹集粮食、食盐、药品、衣物等。

后来经戴克政介绍，纪荣结识了抗联二军五师师长陈翰章，便同时给二军五师提供粮食和情报。

1937年以后，日寇在长白山区实行“归屯清野”政策，对东北抗联疯狂扫荡。为方便行军，五军二师把这盘小石磨安置在威虎河地区的抗联密营中使用。此密营位于敦化、蛟河与黑龙江省交界处，由戴克政、陈翰章于1935年选址建造，抗联五军二师、三师和二军五师共同使用过。1938年8月戴克政在与敌作战中壮烈牺牲后，这个密营及石磨主要由陈翰章的部队使用。

1940年初冬，纪荣又给密营送去一批给养，只见到20多个伤病员——他们很长时间没有陈翰章的消息了，见纪荣送来了急需的粮、盐、药品，非常高兴。1941年1月，距离过年还有20多天，纪荣再次去这个密营送粮时，远远地看到地戥子已被烧毁，心想“糟了，抗联战士遇难了”。

在被烧过的地戥子上，纪荣发现了仅存的小石磨，他想，这是抗联的遗物，便用马爬犁把它拉回家里藏了起来。

作为纪荣和戴素云的二儿子，纪福来多次听父母讲过母亲家族“戴家军”英勇抗日的故事和石磨的来历。纪荣告诉孩子们，这盘石磨6年多时间里在抗联中使用频率极高，其间他曾重新凿刻过八九次磨道，石磨的总厚度被磨去2厘米。

1990年，在从蛟河往长春搬家时，纪福来不辞辛苦，把这盘小石磨带到新家，同时还带去了抗联五军使用过的部分工具——锯、斧子、凿子、剪子、锥子，还有戴素云曾用来为周保中将军取出腿中子弹的钳子和小刀。

中天下，只愿文章中试官。”而在民间传说中，徐渭第一次考试，考官觉得文章好但是太短，于是，他第二次考试就写了一篇长文，在试卷上写不下，就写在桌子、凳子上，最后连卷子、桌子、凳子一起交卷，从此才有了“徐文长”这个名字。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这是徐渭题写在《墨葡萄图》上的一首绝句，诉尽了一生的辛酸。“中”的最后一竖长长落下，远远看去，犹如一个巨大的惊叹号。

璞中美玉

徐渭去世之后，他的声名逐渐被世人所遗忘，直到当时的文坛领袖袁宏道游历绍兴，读到了他自编的诗集，激动地“读复叫、叫复读”，还专门写了《徐文长传》大力揄扬。徐渭的艺术才又逐渐得到世人的认可。

“苦难和不幸在他身上留下巨创，但他有坚强的毅力，如同遭受雷击的大树，在焦黑的枝干之间重又布满葱郁的浓荫。”在《徐渭年谱·自序》中，徐朔方教授这样写道，“这就是他的诗、画、戏曲和书法的创作。”

“在徐渭的墓园门口，有一副对联：‘一腔肝胆忧天下，满腹经纶传古今’，这是对徐渭一生的最好概括。”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陈野研究员说，徐渭不是一般的艺术家，一生走南闯北，上过抗倭战场，也去过北方边疆，经历丰富不亚于现代人。个人天赋、人生阅历和境界，风云际会在他一人身上。

“他是对政治有抱负，对人生有追求的人。中国古代不少艺术家都是这样，只是因为其他领域实现不了个人抱负，才把才华彰显在艺术上。我们不仅要要从艺术家的角度去理解他，更要从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修养去理解他。”

徐渭8岁那年，王阳明去世，两位绍兴的文化名人擦肩而过，但是徐渭也有机会追随两位王门弟子季本和王畿学习。此后，他还与主张学习“唐宋八大家”的明代唐宋派代表人物唐顺之、茅坤有交集。江兴佑说，徐渭的艺术风格并不脱离时代，而是时代发展的产物，而这些高质量的“朋友圈”更开阔了徐渭的艺术视野，“特别是阳明心学是徐渭的精神支撑，形成了他敢于否定权威、追求个性表达，直白而强烈的性格。”

“徐渭一生经历坎坷，性格确实多疑敏感，自视甚高，但是他一直都在努力，他的人生态度还是积极合作的，并不是完全反叛的人。比如他去给高官做幕僚，为了考试也想自我推荐，是个很入世的人。”陈野提醒说，对徐渭的性格要认真分析。

“如果徐渭完全超然出世了，就不会有那么多看惯现实的流露，他希望社会清明，也希望有明君，只是因为抱负实现不了，才会愤懑不平。也因为这么努力还不得志，他才会得到后人的同情。中国传统社会一方面崇尚建功立业的成功者，也会同情那些有独立人格，注重道德修养、自我修炼的失意者。”

“徐渭早去世了500年。”沈一萍感叹说，他们举办这个展览，最终就是希望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更好地认识徐渭，从他的作品中真正感悟到美。“让观众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美是在哪里的，现代人还需要什么样的功夫和底蕴。”

徐渭艺术馆处北，青藤广场居中，青藤书屋在南，它们是徐渭故里综合保护项目的主要元素。沿绍兴古城中央的解放北路、解放南路一径向南，过了人民西路，到第三个巷口再向右一折，就不远了。

青藤书屋曾经是徐渭幼年读书处，当时叫作“榴花书屋”，后因家道中落转入他人之手，从明代末年开始，地方上的有识之士就把它保护起来，纪念这位“光芒夜半惊鬼神”的旷世奇才。

书屋南边的天井里，植了青藤，留有一方水池。厅堂被一道白墙隔开，向南的墙面上是徐渭头戴逍遥巾的半身画像。两边则是他自拟的对联：“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春天的时候，记者也来过这里。当时有人在他的画像下放了束小花，祝文长先生生日快乐。

徐渭，生于500年前的3月12日。他曾托物言志，感叹自己“璞中美玉石般看”，但是历史会给出公正的评价。